

导 论

一、现代企业理论的简要回顾

尽管经济学家对企业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还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以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基于企业运作的现实描述,分析重点是企业内部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①。

这些思想在马歇尔的巨著《经济学原理》中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该书里,他花了整整五章的篇幅研究工业组织中分工、专业化及知识的作用^②。可惜在马歇尔之后一段时期内,古典经济学家的企业理论思想被埋没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既是古典企业理论的顶峰,又是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发端。马歇尔提出的局部均衡理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连同边际分析方法一起,把企业理论带入了新古典时代^③。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核心,是把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在给定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前提下,考察企业如何追求利润最大化。因

^①斯密还分析了股份公司的代理问题,马克思则更进一步,较系统地研究了企业制度的演进原因与轨迹参见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

^②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1964 年中译本。

^③准确地说,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形成应归功于萨缪尔森。参见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此,严格地说,这种企业理论是在给定企业的条件下关于企业生产决策的理论,它只关心不同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及不同产量和价格的最优配置。在新古典企业理论缔造时期,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分析中引入动态方法及不确定因素,引出了企业家理论,后来的代表人物有熊彼特、奈特等^①。不过,由于企业家内涵界定困难,影响因素太模糊,至今仍不能完全纳入主流框架。

在新古典企业理论占统治地位的几十年里,一些思想活跃的经济学家试图寻找一种真正的企业理论。首先是伯利和米斯1932年他们出版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通过详实的实证材料揭示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现象,这是对古典企业理论思想首次系统的实证检验^②。其次是科斯,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回答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假定企业是存在的,而科斯则表示疑惑:假如交易总是通过市场完成的,为什么还需要企业^③。遗憾的是,科斯的论文发表后,当时并未引起大的反响。相比之下,伯利和米斯则幸运得多,他们的书一时成为引用率极高的著作,并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引发了企业的管理者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鲍莫尔(Baumol)、马里斯(Marris)和威廉姆森。他们认为,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管理者并不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销售收入、企业增长或自身效用最大化。不过,虽然他们的观点是反新古典的,但他们的方法论却是标准的新古典^④。

①有关企业家理论的发展,参见池本正纯(1985):《企业家的秘密》,辽宁人民出版社。

②参见Berle and Means(1932)。

③科斯(1994,P5)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试图发现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

④参见张维迎(1995,P36—37)。

到 70 年代,随着阿尔钦安和德姆塞茨、威廉姆森等相继发表了影响较大的著作^①,科斯的那篇论文引用率直线上升,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突破性进展,为企业理论的新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一个崭新的现代企业理论已基本成型。

从理论基础看,现代企业理论广泛吸收了新古典企业理论、现代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乃至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②

从方法论上看,现代企业理论讲究严密的数学演绎,主要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有关模型。

从内容上看,现代企业理论主要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③:

(1)企业的本质。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企业为什么会存在?无论是新古典企业理论,还是企业的管理理论,都假定企业已经存在,从而回避有关企业性质的讨论。科斯则不然,他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的产生是因为它能节省市场中的成本(或市场交易费用)^④企业之所以有这一功能,就在于它通过不同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及消费者之间缔结了一个契约集,从而实现了分工和专业化。张五常、杨小凯和黄有光等人后来更严格地论证了企业存在的原因^⑤阿尔钦安和德姆塞茨、杰森和迈克

① 参见 Alchian and Demsetz(1972). Williamson(1975)。

② 现代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后来融合为新制度经济学,其微观部分实际上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内容。参见埃格特森(1996):《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③ 钱颖一认为,企业理论包括四方面内容:1.企业的本质和界限;2.企业的内部等级制;3.企业的资本结构;4.两权分离现象。参见钱颖一(1989):“企业理论”,载汤敏、茅于軾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I》(第1集),商务印书馆。

④ 张维迎(1995,P12)把科斯等人的理论称为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间接定价理论。

⑤ 张五常(1983)把企业的产生解释为要素市场合约对产品市场合约的替代;杨

林等人则继科斯之后,明确提出了企业是一个‘契约的集合’的观点,从而把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主体和基石^①。

(2)企业的边界。即企业的规模和范围有多大。科斯提出了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但没有回答企业替代市场的边界,后续工作是由威廉姆森、克莱因等人完成的^②。他们认为,组织交易的方式一般有现货市场、长期合约及纵向一体化(企业)^③,由于交易的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所涉及到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不同,每种组织的交易费用都各有差别,其边界就位于三种组织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的地方。

(3)企业制度的演进。这是马克思最先关注的课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由威廉姆森、纳尔逊和温特等人加以系统论证^④。威廉姆森认为,企业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与交易费用有关,而纳尔逊和温特则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认为技术创新和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相结合,推动了企业制度的进化。

此外,现代企业理论还包括企业所有权分配和治理结构^⑤、企业的内部组织和委托代理^⑥、企业的资本结构^⑦等。

小凯等(Yang and Ng, 1993)则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型。从思想渊源看,杨小凯等更接近于古典企业理论思想。有关其理论的评论参见张维迎(1995)。

① 参见 Alchian and Demstz(1972); Jensen and Meckling(1976), 张五常等人的思想是从他们的基础上发展的。可以说,现代企业理论本质上是企业的契约理论。

② 参见 Williamson(1975, 1985), 克莱因等(1978)。

③ “一体化”是指两个交易单位组织成一个企业的行为。上游单位兼并下游单位称为纵向一体化,比如钢铁厂兼并机械厂(下游单位兼并上游单位亦如此)。两个不相干的单位合并或兼并称为“横向一体化”如钢铁厂兼并食品厂。

④ 参见 Williamson(1980); Nelson and Winter(1982)。

⑤ 有关内容参见张维迎(1995), 杨瑞龙、周业安(1997)。

⑥ 参见 Radner(1992)、钱颖一(1989)、张维迎(1996)。

⑦ 参见朱民、刘珺珺(1989)。

总体上看,契约(或合约)理论是分析企业的关键,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内核。在契约理论的基础上,才有了其他一系列专门的理论。

二、现实中的企业及国有企业改革

企业理论在国内一直很热,但引进现代企业理论却是 90 年代中期的事^①。1995 年开始,国内出现了大量研究企业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普遍运用了现代企业理论的有关思想、方法及写作技巧。也正是在近几年,国内学者开始着手从理论上回答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性质、企业所有权的分配与治理结构的创新、资本结构的优化、并购与破产等一系列问题,虽然还没有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但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理论研究相一致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在政策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十五大报告用了较大的篇幅专门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报告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进一步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与责任。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

^①张维迎发表的“从现代企业理论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文,让国内读者耳目一新。该文最先载于《经济学消息报》1994 年 11 月 17 日,后收入他 1995 年出版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报告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①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②国有企业改革的手段是以资本为纽带，采取多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形式；③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是国有企业边界不断地、适当地收缩的过程。

可以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手段和过程的设计是相当明确的，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有两个最突出的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权利问题，经营者认为自己的权利太小了，而政府认为自己管的力度不够，因为经营者屡屡出现贪污渎职现象，二是政府明知国有经济面太宽，但又害怕收缩国有企业范围会导致经济失控，结果出现了国有资产存量刚性现象。

为什么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两现象？原因当然很多，但笔者以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恐怕在于，理论界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及国有企业的本质问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放权让利，重点是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的积极性问题；第二阶段是企业市场环境改革，形成了一定的硬约束机制；第三阶段就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①，这一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之中。随着制度创新的不断实践，笔者愈来愈感到国有企业在这种思路指导下难以达到预定的目标。

^①有关“现代企业制度”提法的前身即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本质上看，这一思路触及到产权明晰化问题。尽管董辅初、厉以宁等著名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所有制改革这一关键问题，但直到 90 年代才得到广泛认同。

产权改革派在理论上占居上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科斯和诺斯，在他们相继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一时成为时尚。其时，中国经济学家正在苦苦寻找国有企业改革的药方，于是作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一种创造——现代企业制度便应运而生。政府旋即把它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加以肯定。产权改革派所开出的药方主要是明晰国有企业的产权，但从法律上讲，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明确界定了的。既然如此，国有企业需要明晰什么？在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指导上，产权改革派遇到了难题。

再者，企业契约理论介绍进来后，人们发现该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许多做法不谋而合。典型的是承包制和劳动合同制、拨改贷和利改税，前者试图建立国家与企业经营者、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契约关系；后者则试图重建国家与企业的金融合约关系。合约关系的建立给企业带来了好处，尤其是经营者获益匪浅，但并未给企业效率带来多大改进，相反地，还使国有资产流失不少。这不得不让我对企业的契约理论进行重新审视。

从中国国有企业多年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可以深切体会到一点，那就是企业有无活力关键不在于经营者权力的大小，而在于所有者是否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威。国有企业低效率局面一直没有改观，主要问题出在所有者缺位上^①。当所有者缺位时，没有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经营者就没有动力去搞好企业；如果此时赋予经营者更多的权力，经营者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更大，结果企业效率反而更低。产权改革无助于所有者的监督，因为契约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所有权的分配取决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谈判，

^① 樊 纲(1996)等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

而国有企业所有者并不在位，政府手中持有的是“廉价投票权”^①，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约就不可能规范。

因此，改革的焦点就在于，在国有企业的制度背景给定的条件下，如何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反映到理论上，就是如何理解所有者权威与企业契约的关系？企业的契约理论以私有制为背景，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也就很少关注所有者权威的作用^②。在主流经济学那里，权威者被简化为利益关系的协调者，其指挥生产经营的功能却被忽略掉了^③。本书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把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企业性质的重新界定，把所有者权威与企业的契约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加深对企业的认识。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过程作了新的确认，以使二者达到有机的统一。

三、本书的结构、内容与理论尝试

本书通过对现代企业理论的批判性回顾，以及对现实中的企业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冷静思考，认为有必要重新研究企业的性质问题，并赋予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和过程以新的含义。本书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本质上是资本化的企业，它是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契约的集合，同时又体现资本所有者的权威。它在某个时点上表现为一组合约，在一段时期内又表现为契

① 张维迎(1995)给出的一个判断，其思想来自 Harris and Raviv(1989)。

② 这方面威廉姆森是一个例外，他始终相信权威在企业中的重要性。

③ 科斯等人都是这么考虑的。激进经济学家（如 Harginson）倒是注意到了后者，但忽略了前者，因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约集合的再集合。企业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企业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要实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

资本是不断追求增值的货币化的权益，资本化就是资本不断转化成未来收益的过程。资本和权益是一个企业合约的两个方面从物的角度看，企业合约表现为资本实体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企业合约又表现为一组界定权益的规则。资本化就是对企业合约演进的动态过程的抽象，表面上看资本化是一条持续不断的收益流，实质上资本化所反映的是企业合约关系的不断调整。以资本为纽带，不同要素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缔结企业合约，并规定资本所有者所享有的权威同时企业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要使企业持续拥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合约必须不断调整，而这一调整是通过资本权益结构的调整完成的。可以说，资本化的企业制度是企业的一种制度设计，而资本权益结构的动态调整则是建立资本化企业制度基础上的运行机制。资本权益结构的动态调整不仅具有资本集中的功能，而且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当资本权益未得到明确肯定时，后两种功能便不能实现；当其结构调整受阻时，其三种功能可能同时被弱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常常出现前一种情况，转轨经济下往往出现后一种情况。

以上是本书第一、二章的主要内容，也是本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重点。后三章则是前两章的理论框架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应用。

第三章对国有企业制度作了一个历史的、批判性的考察。按照资本化的企业制度的观点，国有企业制度的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在 1984 年以前，对应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背景，国有企业采用传统的 U 型结构，目标是完成计划指标，改革的

重点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第二阶段时间大约在 1984—1990 年，相对于双轨制的制度背景，国有企业的传统 U 型结构未变，改革的重点是企业环境建设（即市场化），企业目标是完成产值、利润指标，企业开始感受到外在的压力，预算软约束状况有所好转。第三阶段的时间是 1990 年至今，对应的制度环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传统国有企业制度开始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利润目标成为企业的首要目标。改革的核心是产权明晰化。尽管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但国有企业仍一直处于低效率状态。

传统国有企业制度因多级代理、信息不对称及委托人缺乏监督动力和能力等问题而导致代理成本过高；市场环境改革逐步硬化了企业的外在约束，但由于传统体制未被触动，国有企业目标和行为自相矛盾，从而弱化了市场的作用。特别是传统体制下只有财产观念，不懂得国家财产如何通过市场运作而增值，因此，企业效益总是难以得到提高。现代企业制度目标提出后，财产观念被打破，政府和职工树立了资产观念，对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有所裨益。但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着眼于资本化，而是一味强调以明晰产权为中心，致使政府更多的是在静态的数字比例上作文章，而不是动态地看待企业发展。结果国有资产存量刚性与所有者缺位相结合，导致国有企业效益每况愈下。据此，本书提出了自己的国有企业改革观——以建立资本化的企业制度为目标，通过资本权益结构的动态调整，搞活国有企业。

第四章论证了实施资本化的企业制度的可能性。首先，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宏观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及经济运行的货币化，打破了资本权益结构动态调整的最大障碍，为企业资本化运作打下了坚实的宏观

基础。其次,伴随着宏观体制的转变,融资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融资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市场融资开始唱主角,这一转变使企业资本化运作有了可行的渠道。第三,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资本供给结构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引致社会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社会储蓄主体的转变和居民作为社会资本所有者主体的形成,这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资本所有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资本化企业制度的实施奠定了社会基础和资金来源。因此,经济体制的动态演进、经济运行的货币化、国家融资向市场融资的转变、国民收入分配的市场化、企业资本注入的社会化及多元化,为资本化企业制度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

第五章着重研究了企业资本化的渠道问题。资本权益结构的调整必须在一个规范的条件下进行。不同所有者的资本交易,才能使国家这个特殊所有者的资本运作具有真正的效果。本书认为,资本扩张方式是资本化企业运作的途径,资本市场是资本化企业的运作载体。要建立资本化的渠道,主要就是选择恰当的资本扩张方式,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资本扩张有内部扩张和外部扩张之分。现实中最重要的资本扩张主要是通过股份制和企业并购实现。对国有企业来说,资本扩张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由于我国目前还面临着国有企业逐步有序地缩小产业边界和国有资本逐步实现向社会公益部门转移的任务,资本市场因而也成为这种收缩和转移的主渠道。

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的资本市场,其主要表现是行政机制进入或侵入市场运作。中国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非均衡的资本市场,主要体现在资本市场发展的被动性、滞后性和非市场化。这两大特征对企业形成了融资约束、并购约束和中介机构约束,从而

抑制了资本化企业的正常运作。要实现资本化企业制度,必须以调整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和实现国有股流通为突破口。

总体上看,本书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

(1)在对现代企业理论的批判性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对现实中的企业深入考察,重新界定了企业的性质,从而把企业的契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了。本书提出,企业本质上是资本化的企业制度,它既是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契约的集合,同时又体现了资本所有者的权威。它在某个时点上表现为一组合约,在一段时期内则表现为契约集合的再集合。

(2)本书把企业的契约理论动态化了。契约理论一般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因而有关企业的性质及企业的边界等问题的分析是分割的。本书则从动态角度,以资本化为纽带,把企业的性质、边界及制度演进问题置于同一框架内加以系统分析,从而得出了资本化的企业制度的结论。

(3)产权学派常常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产权,本书则打破常规,把产权界定为资本权益。每一种企业组织都存在相应的资本权益结构,企业不断发展,实质上是资本权益结构的动态调整,它反映为企业合约关系的持续变动。这样,本书就使产权、契约等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概念动态化了,因而也更有解释力和应用价值了。本书提出了国有企业制度演进的三阶段论,这一分法比以往的研究更有说服力、也更加确切。

(4)本书认为,国有企业长期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资本观念。由于没有具备资本观念,导致所有者缺位、国有资产存量性、资本权益结构调整受阻,结果是所有者无法退出,国有企业代理成本巨大、效益低下。这是一个新的认识。

(5) 本书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在于以资本化企业制度为目标，通过资本权益结构的动态调整，达到目标和过程的统一，从而克服了过去那种改革目标与改革过程不相一致的现象。

(6) 本书通过论证资本化企业制度实施的宏观经济环境及实施渠道，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

第一章 资本化的企业制度

—— 对企业性质的认识

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在人类历史上已存在了很长时间。早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家就试图揭示企业的经济意义,例如,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特别关注股份公司存在的经理人员“疏忽”和“挥霍”的问题^①,这一问题后来被现代企业理论归结为“代理成本”。但令人奇怪的是,以前的经济学家只把企业看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单元。在他们那里,企业不过是一台机器,一头输入原材料,另一头输出产品,至于企业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行为,却从不深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企业在教科书中都是以生产函数的形式出现的^②。直到科斯 1937 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后,企业这只“黑箱”才算被打开。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有关企业的理论迅猛发展,渐渐形成了系统的现代企业理论。它以企业制度为分析对象,运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及生物进化论的分析方法,^③从不同侧面解释了企业的行为特征的制度根源。

① 斯密写到:“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 303 页,商务印书馆。

② 生产函数一般表示为 $Y=f(x)$,其中 Y 为产出, x 为投入物。该函数表明企业从一定的投入可能得到的最大产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函数就代表企业。参见 H. 范里安(1994),《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7 章。

③ 博弈论,英文为 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在决策时会受到其他人或其他企业的影响,而反过来,其决策行为又会影响到其他人或企业,博弈论正是要

第一节 交易费用与企业的性质

一、生产函数的分解

人们一听到企业，马上会想到一个个生产单位，诸如服装厂、钢铁公司等。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凭此直观感受，在微观经济学中把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函数处理掉了。假设 L 代表劳动， K 代表资本， A 代表技术进步，那么企业产出 $Y = Af(L, K)$ ，就是一个标准的生产函数式，它的含义是，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只起着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化器的作用，如图 1—1 所示：

Y 是企业的最大可能产出。企业的投入物相同，产出水平却不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这是技术进步因子在作怪，即企业

揭示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行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相结合，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分析工具，比如企业组织常常被抽象为一个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因为每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对方在想什么，已经拥有什么及已经干了什么；同时委托人和代理人又都是信息不完全的，因为他们都不能完全认识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在这种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条件下，委托人如何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并约束代理人不侵犯委托人的利益，就构成企业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换句话说，企业组织被看作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博弈关系。有关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参见张维迎（1996）。

生物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后，正逐步兴起一门分支学科，叫演进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其分析工具已从原先的马尔可夫过程发展到如今的演进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演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和温特（Sidney G. Winter），他们在 1982 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一书，全面讲述了演进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演进理论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与自然界类似，企业之间相互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不断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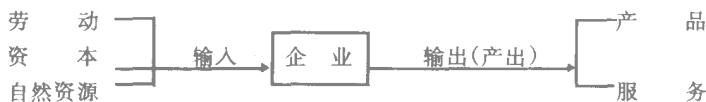


图 1—1 企业作为投入产出转化器

间 A 的差别导致了企业间 Y 的差别。但是,假若两个企业的技术水平也相同,这两个企业会有同样水平的产出吗?或者说排除客观的市场因素和其他外在因素的干扰后,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生产同一产品,能够维持相同的产出水平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现实生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企业采用新技术后,产出不仅没增加,有时反而下降。可见产出并不完全与技术进步成正比。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中的企业行为,关键在于它把企业简化成了一个技术“黑箱”;没有看到企业本身是作为一个复杂组织而存在的。

企业首先是一种制度安排。所谓制度,其实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一些约束和激励。相应地,企业制度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决定人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缔结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游戏规则,它通过一定的激励、约束结构与方式来组织生产、协调利益矛盾及发现获利机会^①。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效率。在制度的作用下,企业产出就不再仅仅取决于“物质上”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制度安排本身。假设 Φ 代表不同的企业制度安排, θ 代表企业的制度环境,如法律、习俗等等,那么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就可以修正为 $Y = F_{\theta}(L, K, \Phi, A)$, 它意味着该企业在 θ 描述的制度环境中,选择了一种制

^① 诺斯(1994),第3页。

度安排 Φ , 采用了相应的技术 A , 通过使用投入物 L, K , 产出了 Y (Jesson and Meckling, 1979).

当我们打开企业这只“黑箱”后, 新古典生产函数就分解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纯技术生产函数, 一部分是制度的作用。 Φ 不同, L 和 K 的利用效率也会不同, 技术因子 A 的选择和利用程度也不一样, 结果 Y 就会有差别。不同的企业制度决定了企业间的效率差别, 这是现代企业理论突出的研究结论。

二、企业作为“契约的集合”

引入制度因素, 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企业的性质。企业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以前几乎无人问津, 企业作为法律规定的一种经济单位, 在人们的眼中已成了理所当然的存在物。科斯当时觉得很奇怪, 他写道: “在企业之外, 价格变动指挥生产, 它是由一系列市场上的交换交易来协调的, 而在企业之内, 这种市场交易被取消了, 复杂的市场结构连同交换交易被企业家这种协调者所取代, 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十分清楚的是以上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方法。然而, 考虑到这样的事实, 如果生产是由价格变动协调, 它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也完全能够进行, 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还要组织存在呢?”^① 科斯的答案是, 企业与市场相比, 是一种更便宜的协调机制, 因为通过企业内生产经营的统一管理, 能够

^① 国内有些人认为, 所有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之间是有区别的。所有制是规定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制度; 经济制度是以所有制为核心来界定、保护和协调人们利益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或规章; 经济体制则是确保经济制度得以运作的组织体系; 运行机制大体上指体制运转过程中的一系列管理措施。比如, 一个企业中, 谁是